

容闳与近代“教育救国” 的思想和实践

作为近代中国热心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一位传奇式人物，容闳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并取得学位的中国学者，也是中国第一次留学外国教育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1855年，他学成回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先后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建言改革，参与“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投入“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最后倾向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其一生几乎经历了近代社会所有的重大事件。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之际，孙中山曾写信邀请当时滞留美国的容闳回国担任要职，信中称：“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故特“恳请先生归国”，大展报国鸿猷，“以巩固我幼稚共和”^[1]，对容闳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爱国心志和救国实践作了高度的评价。从家境贫寒、衣食不足的农家子弟到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从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到

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这种传奇般的经历，使容闳在近代众多的爱国志士仁人之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值得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容闳的经历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他终身致力于国家近代化并为之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所积极从事的教育近代化活动及其“教育救国”主张对近代“教育救国”思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他的少年时代，清朝封建统治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没落境地，尤其1840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对整个古老的中国社会都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容闳曾回忆说：“迨1840年夏秋之交，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龄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往来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天清晨三时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两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家中搢柱，惟长兄是赖耳。予母得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予姊恒与予偕。”^[2]可见，由于家道贫寒，其父早逝，少年时代的容闳曾做过小贩，干过农活，对贫穷落后的乡村生活有着切身的体认和感受，艰辛的生活经历奠定了他后来刻苦求学，立志改造中国的思想基础。

1847年容闳在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的帮助下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次年经严格的考试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容闳异常刻苦用功，“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

动”，且“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得到了老师同学的器重和好评。难能可贵的是，容闳的刻苦学习并不仅仅为了改变个人困窘的境况，而是念念不忘贫弱的祖国，思考将来如何能对祖国的富强贡献一点力量。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容闳的爱国志向。其一，早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容闳曾因生活困难几乎辍学。当时教会方面答应他如果毕业愿当传教士回中国布道，将给予资助。但容闳认为要他当传教士将无法实现日后改造中国的宏图大志，故“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竞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因此，“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3]。坚定地表达了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效力于祖国的决心。其二，1854年秋，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前夕，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这又是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现实问题。他的好友特韦契耳曾说：“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由于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4]但容闳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却促使他毅然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他说：“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

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5]因此，他要用在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不论祖国是何等的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他都对祖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的状况，容闳的设想是把西学传播到中国，促进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实现这种“西学东渐”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兴办近代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6]，并且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参照，把促进留美教育作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7]。

由上述可见，容闳的这种救国主张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1854年底容闳回国后，他所孜孜追求的国家近代化目标基本上都是通过积极从事教育近代化活动，竭力倡导“教育救国”思想这个途径展开的。

二

容闳认为，要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必须从教育入手。他曾说：“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8]因此，当容闳到天京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建言改革时，他提出的七项建议是：“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门行政顾问；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题；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9]很明显，这七项建议中即有四项直接涉及教育，其余三项有关“良好军队”、“善良政府”及聘用“行政顾问”的建议，实际上也间接与近代化的良好教育有关。可见，强调从教育入手，振兴中华，

成为容闳“教育救国”主张的基本宗旨。遗憾的是，“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10]，但太平天国后期的形势已无法给容闳一个施展教育救国抱负的机会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11]，容闳打算借助太平天国实施其“教育救国”的第一个希望遭到了挫折。

不久，以“借法自强”相标榜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为罗致人才，派其幕僚致书容闳，邀请他入幕参与洋务活动。1867年容闳建议曾国藩“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科技人才，这一建议得到曾的支持。容闳认为这是“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12]，以为从此可以大展鸿图，实现其“教育救国”之志。1868年，容闳通过另一洋务大员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四则”，其中的重点在第二项：“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3]在容闳看来，“条陈之条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14]，因为，举办留学教育是容闳“苦心孤诣以从事”的“教育计划”之核心，“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归国十余年来，他亲眼目睹中国的贫弱和人才的缺乏，深感推进教育近代化，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条陈四则”的中心仍然是在于教育。根据容闳的设想：“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15]容闳的这个留学方案提出后，虽未能及时获得清廷批准，但却引起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的高度重视。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等四大臣联衔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容闳得此消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16]，幻想着“十余年梦想者，得告成功焉”！

当然，容闳的自我告慰很快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 1872 年到 1875 年，中国第一次由官费派遣的出国留学生，先后四批，共 120 人，分批横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基本实现了容闳原定的留学教育计划。但留学教育活动的具体实施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当时清政府任命由翰林出身、思想守旧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学生正监督，而以容闳为副监督。陈兰彬于 1872 年带领第一批留美学生赴美后，对他们“监督极严，须穿华服，保存辫发，守祀孔之古礼”^[17]，结果与主张新式教育的容闳产生矛盾。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遂推荐更加顽固守旧的吴子登继任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对于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18]。他还极力攻击留美学生“好学美国人的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实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19]。不仅如此，吴子登还向清廷报告，指责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20]。结果造成了 1881 年清政府作出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的荒唐决定，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而废，满腔教育救国之心血付诸东流。

实际上，围绕近代中国第一次留美学生的派遣和撤回所展开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因为，顽固守旧势力攻击留学教育为“离经叛道”，指责留美学生“效尤美人”、“囿于异

学”，反映的是他们害怕留美学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熏陶之后，将成为封建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最终对清朝的封建统治不利。而清政府派遣留美学生的本意也是培养一批既能够自觉恪守封建伦理、“尊君亲上”，又能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现在目的既然难以达到，那么决定尽早撤回留美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而，留美教育计划的最终流产，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冲突对立的结果，正如容闳所指出的：“东西文化判若天渊……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21]

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虽然终归失败，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事业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留美学生返回祖国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22]，并且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近代中国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第一代人才。更重要的是，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虽然中止实行，但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却由此兴起。甲午以后，“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23]。出洋留学的益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开始形成社会风气。与此同时，“西学”也就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而迅速“灌输于中国”，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因而，正是在这点意义上，我们认为容闳所积极从事的留美教育活动无可置疑地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历史地位。

三

容闳对国家近代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还体现在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对甲午以后兴起的“教育救国”思潮的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甲午以后各种救国思潮此伏彼起，最后形成以维新变法为中心议题的救亡图存主体思潮。在众多的救国思潮中，

“教育救国”是有相当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而我们考究其发展源流，容闳提出的“教育救国”主张对该思潮的影响显然不可忽视。例如，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变法要知本原，不知本原，事情就无从做起。在他们看来，当今中国的局势是“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成国，原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而“愚民之术，莫若今之不学”^[24]。因此，变法的本原就是“教育”，首先应该从教育入手，讲求“学问保国”之道。而如前所述，容闳早在数十年前就把致力于教育近代化作为振兴贫弱中国的救国之道，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和培养新式人才，并竭诚终身为之奋斗，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一个早期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

再如，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救国”论者认为，要变法救国，迅速赶上西方文明，必须广派游学，采万国良法，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因此十分强调：“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25]。而容闳不仅自己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出洋游学并取得学位的“才俊”，而且也是近代中国首次出洋游学教育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在当时仍视西方国家为夷狄之邦的传统氛围之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必然会遭受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封建传统意识观念的困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据当时一位留美学生的回忆，他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消。”^[26]但容闳为了通过举办留学培养人才，“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知难而进，不遗余力，促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留学教育。“种子既播，终不灭亡”，第一次留学教

育虽中途遭到挫折，但此后留学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的确如容闳所言：“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7]

此外，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救国”论者十分注意国民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8]，“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9]。那么，什么样的国民才称得上“新民”呢？维新派提出要从力、智、德三方面提高国民素质，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会、强国保种的要素”^[30]。而容闳在提倡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时，对这一问题也有论及，他认为对人的教育，在于培养新的理念，新的人才。他说：“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31]在容闳看来，一个人受了教育，就有了知识，有了力量，有了道德理念，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才会感受到国家的贫穷、人民的痛苦，才会产生救国救民思想和行动。可以看出，容闳的这种教育思想与维新派的“新民”思想显然也有相通之处。

应当指出的是，不论是容闳的“教育救国”主张，还是后来的“教育救国”思潮，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都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之道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尽管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思想主张无法也不可能实现，但对我们现在提倡“科技兴国”却有着历史启迪意义。容闳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当之无愧的倡导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1]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144页。

- [2]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 页。
- [3] 容闳：前引书，第 19~20 页。
- [4] 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第 165 页。
- [5] [6] 容闳：前引书，第 74 页；第 23 页。
- [7]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
- [8] [9] [10] [11] 容闳：前引书，第 64 页；第 57 页；第 23 页；第 32 页。
- [12] [13] [14] [15] [16] 容闳：前引书，第 121 页；第 122 页；第 88 页；第 122 页；第 90 页。
- [17] 《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载《东方杂志》，1918 年第十四卷，第 12 号。
- [18] [19] [20] 容闳：前引书，第 104 页；第 138 页；第 138 页。
- [21] 容闳：前引书，第 144~145 页。
- [2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2 册，第 167 页。
- [23] 参见张之洞：《劝学篇》。
- [24] 徐勤：《中国除害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56 页。
- [25] 《请派游学日本折》，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0 页。
- [26] 刘真：《留学教育》第 1 册，台湾国立编译馆 1980 年版，第 83 页。
- [27] 容闳：前引书，第 91 页。
- [28] 参见《新民丛报》创刊号，《本告白》。
-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 5 页。
- [30] 参见黄海峰郎：《论今日最重要的两种教育》，《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 6 期。
- [31] 容闳：前引书，第 61 页。